

一家饭店吃了30年，还想吃，应该是真好。

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如此，女儿从美国回到南京，刚下高铁第一站去的就是大牌档。那是乡愁，那是记忆，那是时间。她担心家乡的味道变了，可南京大牌档依然如故，她觉得故乡真亲，故乡的美食真好。

据说开饭店有个七年理论，一家饭店如果坚持了七年，基本不会垮了。就像婚姻也有个七年之说，一个家庭经过七年的风雨基本不会散了。开饭店其实也是饭店与顾客磨合的过程，而南京大牌档我居然吃了30年之久，从南京到北京。我早就想写写它，但担心有做广告嫌疑，要申明，我就是一名普通顾客，没有任何的特别之处。

时间是1995年，那时我们喜欢在苏童的那个小阁楼上搓麻将，牌局完了就去周围找家饭店吃晚饭，但很少有愿意再去吃的。那天中午，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制片人来找我们做一个《牡丹》的节目，录完片子，想找一家饭店用餐，出门发现，对面新开了一家店。起初我们认为



我很羡慕有书房的藏书朋友。“高斋晓开卷，独共圣人语”是我的梦境。我曾问一位作家老朋友：“你有书房吗？”出乎意料的回答是：“没有，但我家里有书的‘房’”，我疑惑地问他：“书房与书的‘房’有区别吗？”他答：“区别在于集中与分散。”睿智的回答即刻让我释然，不必苛求专门的书房，购买看完收藏的书只要有它安身的地方就是它们的“房”。

我出生于毗邻上海交通大学的老式石库门，居住面积33平方米的三间后厢房里，有我单独的一个三尺小床，“文革”前，家里订了《小朋友》《儿童时代》等杂志，床头、枕下、床下的纸箱就是它们的“房”。

1971年2月上中学后，开始用零用钱购买自己心仪的书，慢慢地积攒了百余本书，于是在床脚处的墙上打入两根柱，搁上一块长约80厘米，宽约25厘米的木板，成了这些书的“房”。随着书的增加，书的“房”从一层增加到三层。

1975年参加工作了，有点财务自由

书的“房”

仇志强

我的回答是：“没有，但我家里有书的‘房’”，我疑惑地问他：“书房与书的‘房’有区别吗？”他答：“区别在于集中与分散。”睿智的回答即刻让我释然，不必苛求专门的书房，购买看完收藏的书只要有它安身的地方就是它们的“房”。

我出生于毗邻上海交通大学的老式石库门，居住面积33平方米的三间后厢房里，有我单独的一个三尺小床，“文革”前，家里订了《小朋友》《儿童时代》等杂志，床头、枕下、床下的纸箱就是它们的“房”。

1971年2月上中学后，开始用零用钱购买自己心仪的书，慢慢地积攒了百余本书，于是在床脚处的墙上打入两根柱，搁上一块长约80厘米，宽约25厘米的木板，成了这些书的“房”。随着书的增加，书的“房”从一层增加到三层。

1975年参加工作了，有点财务自由

出院的时候，再把它们搁在书柜里，想起从前的日子，不禁感慨一番。这是送这特殊礼物的初衷。

亲戚出院，整理东西，脸盆、水杯，什么也没有少，就是少了这个小玩具。不管是被有意拿走还是无意丢失，也许，它是去继续陪伴需要它的人了。

我买了一模一样的那款向阳兔，重新置于我的床头柜。

“波斯猫家族”，在大悦城逛时，被不同的两款吸引。白色与灰色的植绒猫头与猫手是相同的。不同的是所穿的衣服，四个一套的系列，一个是红色黄色的暖色调，一个是蓝色绿色的冷色调，奢侈一下，全买

了，第二年，我就购买了当时最流行的五层斑竹书架，后来又买了一个。但这个书的“房”对书来说，居住环境不太好，沾

灰是常有的事。1984年结婚时，在凭票供应的全套家具中，又定制了一个大书橱和书桌。从此，上面四层玻璃门下面两层木质门的书橱大大改善了书的居住环境，也成了书的“新房”。以后每搬一次家，书的“房”都是装修中的重中之重。

我现在的住房不大，但三房一厅，每处都有书的安身之处。随着书的逐步增加，它们居住的“房”有点拥挤。2012年，我在原来的封闭式大阳台的一端做了一个高1.5米，宽1.05米的五层书橱，每层高30厘米，深度53厘米，前后可以放三排书。这个书的“房”虽然拥挤一点，但书橱门一关，风尘日晒全部拒之门外了。

我的藏书不多，近万册而已，我虽然没有书房，但每间屋里都有书的“房”。



出院的时候，再把它们搁在书柜里，想起从前的日子，不禁感慨一番。这是送这特殊礼物的初衷。

亲戚出院，整理东西，脸盆、水杯，什么也没有少，就是少了这个小玩具。不管是被有意拿走还是无意丢失，也许，它是去继续陪伴需要它的人了。

我买了一模一样的那款向阳兔，重新置于我的床头柜。

“波斯猫家族”，在大悦城逛时，被不同的两款吸引。白色与灰色的植绒猫头与猫手是相同的。不同的是所穿的衣服，四个一套的系列，一个是红色黄色的暖色调，一个是蓝色绿色的冷色调，奢侈一下，全买

了。一款自己玩，另一款日后送给喜欢的小朋友，想象她眼睛里闪耀的惊喜，自己也随之开心。

房间里，站在音响上的棕熊，半尺高，黑衣黑裤警察装，

脖子上挂一块“特警000110”的牌子，帽子也是一顶警察帽子。它的貌似威严，是双倍的萌翻了。朋友送的爱心礼物，擦灰，每一次都小心翼翼。

熨斗基本不用。放熨斗的小架子可以折叠，干脆从烫衣板上取下来，做成一个小床铺。一个有被子盖的小娃娃就睡在上面。台灯下，你看书，她

“撑”的学问。至于怎么撑，“海阔凭鱼跃、天高任鸟飞”——杜普兰蒂斯随心所欲肆意诠释。倘若“一厘米哲学”，仅解决金钱问题，显然斤斤计较俗不可耐；只说明心理作用，难免高不可测故弄玄虚。要问：何时突破6米

31,第15次提

升一厘米？人类究竟撑杆能跳多高？杜普兰蒂斯也不知道。哲学，本来就没有答案。无终极答案、有始终感悟，才是哲学的奥妙之处。

若有，天晓得！

记得三年前，偶尔在电视上看到杜普兰蒂斯跳过6米20，有感而发写过一篇《撑杆跳高与人生感悟》。把

撑杆比作事业，要高高举起，负重飞奔。再找准支点，利用反弹作用力，安身立命。然后，头朝下（谦虚做人）脚朝上（勤快做事），此时切不可昂首抬头，否则必倒无疑。

最后，上升期完成转

身、全力撑起，再果断放手、腾空越杆——全身而退、完美人生！

撑杆跳高，撑杆是手段、跳高是目的。难度最大也最值得玩味的，就是上升期——头朝下脚朝

上的华丽转身。人生，何尝

不是如此。只是退休后，还

想借着权倾一

时的力道再三拿起“撑杆”找支

点、伺机反弹攀高，大概率是四脚

朝天摔倒，自惭形秽。

“一厘米哲学”，既没答案，又

有答案。杜普兰蒂斯知道自己能

跳多高，但他知道：总有那

么一天，撑不过！退休后，谁

都想长命百岁，但都明白：

总有“撑”不过的“那一天”！

是拿着退休金，长吁

短叹：盛年难再、我亦飘零？还是

拿起“退休撑杆”，另找支点，转身

转型，向死而生，撑出属于自己的

“一厘米”高度？

往往是这样，失去了，才懂得

珍惜。退休后，最容易失去但最值得拥有的，不是别的，是肌肉。一

过六十岁，流失加快。人生最后一跤，全因大腿肌肉无力，跌进黄泉。此时，金钱地位声望名誉，在肌肉面前，一文不值。

言归正传：与其往银行里存一厘米厚的纸币，不如往双腿上存一厘米厚的肌肉。大腿无力却腰缠万贯，带不来下半生的幸福，反而引起子女为遗产争得头破血流。有出息的，不在乎你的那点钱；没出息的，天天盼着你的“那一天”。只要肌肉在，就算五脏六腑需动手术，尚可走出病房。但即便明眸皓齿沉鱼落雁，肌肉没了——对不起，只剩卧床不起、坐等送终。

如此看来，撑杆跳高与退休感悟，别无两样，不就是一个字——“撑”么！要不，你也来撑一撑？比如俯卧撑、大腿深蹲。不求多，每天撑一撑蹲一蹲。一年下来，你会发现，所谓“一厘米哲学”，即无哲理可言，也无真理可求。所有答案，全在自身！

学到多少专业课。慢慢地，她们也琢磨出自己的法子，常相约以“看大字报”为名，几乎逛遍了上海所有公园。在人心易受污染、美好渐趋模糊的年月里，两个向内求真的女子，就这样结下了深厚的“革命友谊”。

分配工作后，她们仍被卷入那场“锻造新一代”的运动，分赴外地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了一年半。有同学说母亲和明姨是“物以类聚”，明姨也曾对母亲说：“你我无论何时何地都感觉投机，确实是真同类。我一直佩服你——我只知道看小说，你却涉及评弹、音乐、宗教、伦理，又精通日常大小事务，是个人才。记得在学校读你藏的《收获》，后来复刊了，我也学你一直收集，直到出国。”

40多年前，母亲把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礼物——我的爷爷钱瘦铁画的一幅《江上渔者》送给了最好的朋友永远留念。40年后，这幅画漂洋过海，重回上海故人手中。

“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”但真正的友谊从不计较距离与时间。这些年来，她们相隔半个地球，却始终是彼此最能敞开心扉的人。在我眼中，她们依然是那两个手拉手逛公园的女生，从未走远。

是我推荐的功劳，而是它自身菜品受到了顾客的喜爱。美食的产生，是老百姓用嘴巴投票的结果。

有一次我请时任《花城》主编的朱燕玲在北京吃南京大牌档，吃完，她激动地说，要是广州也有就好了。过了不久，她告诉我，广州也开了。语气很兴奋，很自豪。这位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广州的南

京姑娘，能随时随地吃到家乡的美食，不仅解乡愁，也为家乡的美食能在最能吃会吃的广州站稳脚跟而自豪。

有趣的是，当年在洪武北路当领班的小姑娘孟凡，闫导私下悄悄称她是江南版的巩俐。20年之后，我们居然在北京的店相遇了。她一眼就认出了我，王老师没变啊。我也一眼认出孟凡，虽然小姑娘变成了总经理，但气质和模样没有变。故人相见，甚是欣喜。可孟凡告诉我，北京这边开拓成功了，她很快就要离开了。过几天她要出国了，要陪孩子去加拿大念书了。

大洋彼岸有大牌档吗？也许有，也许没有。



南有嘉木
(篆刻) 裴国强

得用特制的桂花糖浆慢熬，火候到了，才有这股色泽光亮、酥软甜腻的意境。

天王烤鸭包则是南北混搭。这小笼汤包，皮极薄，能瞧见里头晃荡的汤汁，真如梁实秋在《汤包》里写的一样，“抓住包子的褶皱猛然提起，包子皮骤然下坠”。可内馅儿却不是寻常的猪肉，竟是烤鸭肉。一口咬开，鸭油的荤香混着鲜甜的卤汁涌入口中，是烤鸭的香，又是汤包的鲜，两下里一撞，撞出个新巧别致，难怪能登上“中华名小吃”的榜单。

硕大的清蒸狮子头安稳地坐在清汤里，旁边衬着几叶青菜，模样素净。用勺子轻轻一碰，那肉团便“颤颤巍巍，吹弹可破”似的。送入嘴里，当真就化开了，肥而不腻，鲜味是文火慢炖了六个时辰才浸透进去的，是份不急不躁的厚道。

我们和各路的朋友连吃了几天，过了一周，闫导又打电话给我和苏童，说

夜晚归家，见母亲满面生光，话音里都带着雀跃：“今朝同玥碰头了。”玥姨是母亲大学同学，更是她半生知己，长居温哥华。“你猜玥送我什么？”她忽然问，眼中泪光闪动。素来冷静的理工女这般情状，让我一怔。玥姨出国早，我高三时曾收到过她捎回的一套倩碧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着实稀罕。后来年年送礼，却再难有当初的震撼。

母亲见我半晌没有反应，迫不及待地拿出了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小纸卷，说：“这是你爷爷的一张小画，我挺喜欢的，玥出国时我送给了她。没想到这次，她竟然送还给了我。现在的世道竟然还有这样的人！玥讲，‘这画本就是你们家的念想，该叶落归根了。谢谢你四十年前把家中宝物送我。我拥有它、欣赏它四十年，已经很满意了。’”

说起她们二人的情谊，须将时光倒回一甲子之前。1963年，她们一同考入上海科技大学化学系，大学最美的光景，她俩一起度过，功课做完，便去嘉定老街上闲逛，像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里那般无忧无虑。吃八分钱一碗的鲜肉小馄饨，再慢慢悠悠踱回宿舍。

然而她们迎面撞上了那个特殊的十年。68届大学生虽未上山下乡，却也未

请我们吃南京大牌档。原来他回去和新婚妻子讲了，妻子就把新婚旅行地点定在南京，而且，第一顿就在大牌档。

到了北京之后，一直想念它家的味道，没想到多年之后，大约是2015年，大牌档在工体三三开了一家。我一开始有些怀疑，很多美食换了地方会

变味”，有原材料的问题，还有水的问题，还有水土不服的问题（很多在原产地很受欢迎的美食换了地方，当地人不一定接受），但这家居然完美地再现了当年的美味，我感动得不知怎么表达，就不断请朋友吃，向朋友推荐。现在北京有了十余家连锁店，遍布东南西北。这当然不

引，本来只想买几个，看到剩着的那几个似乎孤零零的，便全买下来了。一共八枚，用长方形的透明塑料盒子装起，放在五斗橱上。

二次元是如今的流行语。那些小玩意儿都是二次元。所有的玩具也都是二次元。我们自己也是二次元，可能也是三次元了。二次元与三次元合得来。或者，与玩具二次元的结合，能使人类三次元变成二次元。二次元与三次元心意相通，彼此抚慰。你相信吗？你每天注视它们，会发现它们是有生命的。

一代人
有一代人的流
行，一个兔儿
爷玩具也值得
一直珍藏。

每天注视五分钟

南 妮

出院的时候，再把它们搁在书柜里，想起从前的日子，不禁感慨一番。这是送这特殊礼物的初衷。

亲戚出院，整理东西，脸盆、水杯，什么也没有少，就是少了这个小玩具。不管是被有意拿走还是无意丢失，也许，它是去继续陪伴需要它的人了。

我买了一模一样的那款向阳兔，重新置于我的床头柜。

“波斯猫家族”，在大悦城逛时，被不同的两款吸引。白色与灰色的植绒猫头与猫手是相同的。不同的是所穿的衣服，四个一套的系列，一个是红色黄色的暖色调，一个是蓝色绿色的冷色调，奢侈一下，全买

听你翻书的声音。她双目紧闭，嘴角含笑，仿佛与你一同感受书中的美好。有一次，小娃娃连着铺盖一同失踪。蓝色小格子图案的“熨斗床”光溜溜的好生寂寞。直到第三天，小娃娃才在楼下的角落里找到。又在几天后的一幕真实场景中，侦破了案子：是家里的白猫，跳上柜子，嘴衔娃娃，悄悄从楼上蹿到楼下。那一刻，它是它的好玩具。

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，在市中心一家电影院的卖品部，看中了几个植物娃娃。一颗颗闪亮的彩色圆形塑料，南瓜、甜椒、李子、草莓……黄头发紫头发的小人儿的脸嵌在果实中，或眨眼调皮，或做惊讶状。为漂亮的颜色与有趣的造型吸